

“融合之都·从此大同：大同长城与民族融合座谈会”发言摘登

编者按

2023年12月28日，大同市委统战部举办“融合之都·从此大同：大同长城与民族融合座谈会”，来自全国各地的长城专家、学者30余人出席，共同探讨大同地区长城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密切联系，挖掘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中的历史内涵。在此摘登部分专家、学者发言，以飨读者。

长城文化与中华文化一脉相承

董耀会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乎国家安全命脉。在这个意义上说，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举办大同长城与民族融合座谈会意义重大。

中华民族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方面，长城文化与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关系。修筑长城这样强大的防御工程，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不打仗，背着长城打别人是不可能的。古代长城是为了调节农耕与

游牧双方的关系，是为了构建长城两边的交往秩序。长城展现出来的和合包容的精神，其实就是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认同。今天打造长城这一中华文化的重要标志，将对坚定文化自信，构筑民族向心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大同市委统战部多次组织专家、学者进行学术考察，推动长城文旅融

合发展，将文旅融合置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大主题、大框架下，很有前瞻性。那么，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大主题下，文旅融合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叠加在一起，如何做好呢？第一，要让文化好玩。旅游是个消费行为，只有好玩才能吸引人，才能让人愿意掏腰包；第二，要让旅游有文化，游人都有文化需求，许多时候是我们没有给人家提供这种满足文化需求的服务，八达岭长城“长城少年使者”项目，让中小学生在文化感受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十分火爆，就是成功案例。

（作者系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中国旅游协会长城分会会长）

长城在民族融合中的作用

张俊亮

长城除了防御功能以外，还有很多作用，今天谈谈长城在民族融合中的作用。

一、长城见证了民族融合

民族融合是指历史上两个以上的民族，由于互相接近、互相影响、互相通婚、迁移杂居，民族之间的共性逐渐增多，各民族互相学习、共同发展，通过经济、文化的作用，使一个民族经过自然的过程合于另一个民族，最终形成一个民族的现象。民族融合是多民族国家的普遍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古今中外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变化、发展，都与民族融合紧密相关。

民族融合是民族间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俗密切联系的结果，是一个互相渗透的过程。民族融合有利于民族矛盾的缓和，有利于各族经济文化的交流，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二、长城促进了民族融合

长城是中国古代的军事防御体系，修筑长城是为了少打仗或不打仗。长城的修建，规范了长城两边各个统治者的军事扩张行为，双方减少了因为争抢地盘而发起战争。由于战争的减少，双方得以发展生产，安居乐业，边关互市正常进行，民族交往可以开展，出现了跨区域的长途贸易。长城成为了民族交融的舞台。

汉朝在边境关口设关市，作为与外国使者的互市市场；魏晋以后，又称“交市”；隋唐沿边设互市，以马市为主；五代时，私贸兴起；周周开始允许民间与回鹘私市；宋、辽、金、元在边境设榷场互市；宋、明时期同边疆各族进行的茶马互市也很频繁；宋以后以茶、盐等同边疆各民族互换马匹。

北魏前期为了保障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的安全，在平城以北边境长城沿线设立了六个军镇，史称“北魏六镇”，六镇不仅和北方长城共同



构成北魏王朝抵御异族的防线，而且是北魏军队主力驻扎的主要地区之一，更是连接漠北与中原的交通要冲。北魏先修长城，后在长城沿线设军镇，为汉族和鲜卑族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

三、长城规范了民族融合

修筑长城不是为了封闭国门，而是为了更好地、高质量地开放，是为了规范一些商业活动，促进商人之间正常的礼尚往来和交易行为。长城也规范了民族融合。长城抵御了外侵，但阻隔不断亲情。生活在长城内外的各族民众，以邻为伴，以邻为善，互相影响着各自对方的生活习惯，传授着各自的生产生活技能，共同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和民族融合。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古代的双边关系始终处于时好时坏的状态，通婚自由，走亲访友、贸易往来不受限制，长城的出现，为规范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提供了舞台。

（作者系忻州市长城学会副会长、秘书长）

长城文化与民族交融的大同形象

李鸿宾

的职责；然而步入一统化的王朝之后，它就发挥着沟通南北、联系长城内外的作用，这在前期的唐朝，尤其后期的元朝和清朝的身上，表现得最为典型。

元、明、清以后的大同，“连接”农耕和草原的这项功能，成为人们了解这段历史的突出见证。“茶马互市”、“走西口”、晋商北上这些古人东西南北交往互通的行为，勾勒出这一时代历史场景的重要面向，这正是大一统王朝的整体布局释放出来的一个效能。

时至今日，历史文化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资源，随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增强，大同丰富的历史内涵、交往融合的民族团结，在国家的发展和兴旺之中，扮演的角色日益凸显；其南北东西的联系与互动的象征，亦与日俱

增。在古老文明摇篮的山西境内，大同以其商周延承明清的中国多元文化汇聚和多民族共处的北部之战略角色，连同她肩负的传统文明的一个突出的承载点而被人铭记，在今日山西整体的建设中也以代北名城伫立于世。如何进一步阐发大同包含的文化特质，在社会建设和发展的同步之中追寻其精神内涵以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既是大同面临的重任，也是现实赋予她的一项使命。我们今日召开的这次定名为“融合之都·从此大同：大同长城与民族融合座谈会”，从程序上说，是为2024年召开更大规模的会议做准备，但从意义上讲，则是大同与代北推进山西文化事业乃至社会发展的一次战略考虑。希望以此为契，大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加强民族团结中，继续发挥出自身应有的作用。

（作者系中国长城学会副秘书长、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长城是民族交往交流融合的大舞台

李大公

长城主要是为了防御北方的少数民族而建，是战争产物。历史上各个朝代向长城沿线广大地区移民、屯田，长城区域的征战本身在客观上都起到了促进民族融合的作用，因此，长城不单单是军事防御工程，长城所在区域更是古代各民族交错杂居，既互相对抗又互相学习，乃至共同生活的地方，由此产生了广泛的民族融合。

在长城区域两千年的民族融合过程中，除汉族外，与长城关系最密切的有匈奴、鲜卑、氐、羌、突厥、契丹、柔然、女真、

蒙古等十几个少数民族，他们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长城区域与汉族或其他各民族之间相互融合。同时，有些少数民族还直接参与了修筑长城。明、清两朝，长城在民族融合的力度和广度都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以大同为例，大同长城可以说是最典型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界线，也是汉族和其他多个民族交往、交流、融合的大舞台。“融合之都·从此大同”八个字，更是十分经典，充分说明了大同地区

在中国古代多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巨大贡献和独特地位。

总之，长城不但保护了中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保证了中原地区的强大和统一，而且促进了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高度融合。因此，长城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意义上，长城确实发挥了民族融合的纽带作用。

（作者系山西省长城保护研究会会长）

长城地带民族关系中的女性角色

高晓梅

俺答汗明蒙复市，三娘子边塞安宁

1552年春，经过“庚戌之变”，明廷被迫接受开放关市的条件。但只开一次市后就关闭了市口，明蒙烽烟再起。隆庆五年（1571年）达成最后协议，实行互市。俺答汗受封为“顺义王”，至此，明蒙互市正常，蒙古地区和明朝之间的关系逐步密切起来。

万历九年，俺答去世，其妻三娘子协助其长子僧格、长孙扯力克主政二十余年，继续推行与明政府和平安友好的政策，维护蒙汉团结，保持了边塞的长期安宁，使蒙古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更加密切。

万历十五年春正月，明政府册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并赐予金银绸缎等

物，用以表彰她在促进明蒙和平贡市，维护边塞安宁等方面所建立的功勋。

千秋吟诵公主情，万世流芳励后人

四公主即恪靖公主，康熙皇帝六女儿，因在得到封号的公主中排行第四，故称四公主。四公主生于康熙十七年（1679年），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嫁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察罕多尔济之孙敦多布多尔济。

四公主是最早代表官方在口外清水河地区放垦，实行开边抚民政策的重要人物。这一事件就是人们常说的“走西口”。

四公主常住归化城后，每年夏季要远赴库伦（乌兰巴托）一次，协助额附敦多布多尔济处理事务。四公主每次远行库伦，除带府内随行人员外，后面还有大量行商尾随。久而久之，由四公主往返归



化与库伦同踏出的这条道路，便成了后来成就一代晋商的草原丝路、茶路。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市长城科普学会会长）

阻挡销蚀，南下的力量得以缓冲，于是由碰撞缓解而融合。可见，大同长城在民族融合中发挥着独特的功能与作用。

大同地处北纬40度线，年降雨量400毫米的黄土高原，地缘呈现农牧交错状态。为了稳定彼此的生产与生活秩序，大同长城便发挥了巩固边塞民族生存发展的初衷，更重要的是起到了民族融合的特殊作用。

大同盆地长城，是中原王朝的依托，一次次阻止草原民族的南下，草原民族也一次次在盆地接受着中华文明的熏陶；大同盆地长城因战争刺激了民族长盛不衰的生存能力与战斗精神，也因和平涵养了民族融合理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信仰，夹杂着政治一统、马市经济贸易、文化交流、胡汉亲和、走西口移民等民族融合的相关内容。

（作者系大同长城学会副会长）

嘉靖时期边外山西汉人群体探究

李海林

嘉靖时期，长城内山西汉人不同群体，通过多种途径走出长城，进入蒙地，自觉或不自觉融入当地，加强了蒙汉民族经济与文化的交流。

（一）被掠夺而去的汉人群体

嘉靖时期，驻牧于宣、大边外的俺达兴起，由于嘉靖皇帝实行“绝贡”政策，蒙古部落又亟需改变单一的经济现状，故频繁大举南下。这一时期，被掠夺的汉人尤其多。这些被掠夺的汉人，除充当奴隶外，也有获得土地、牲畜，成为被剥削的农民。

（二）躲避赋役的农民群体

明朝中期，赋役繁重，山西北部民众因地缘关系，纷纷逃往边外，谋求生存，在边外定居。《五杂俎》载“临边幸民，往往逃入虏地。盖其饮食、语言既已相通，而中国赋役之繁，文网之密，不及虏中简便也。”明朝的腐败，繁重的赋役，使得大量的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蒙古丰州川的开发，农牧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衣食无着的汉族劳动人民自动走出边外，谋求生存。

（三）逃至板升地区的汉人知识分子

俺答汗为了建设丰州地区，对于迁徙到丰州川的有知识、有才能的汉人比较重视。嘉靖三十四年“丘富说俺答收奇伟儒士，县书穹庐外：孝廉、诸生幸辱临胡中者，胡中善遇之，与富埒。于是边民黠知书者，诈称孝廉、诸生，诣虏帐，趾相错。俺答令富试之，能者统众骑，不则给廪脱地，令事锄耨”。这个政策吸引了部分汉人知识分子前来为蒙古部落效力。由于蒙汉语言不同，蒙汉人民的交流会产生诸多问题，俺答汗亦让一些汉人知识分子到蒙古部落中去教授汉文。



（四）边外谋生的贸易群体

嘉靖皇帝的“绝贡”政策，使蒙汉双方处于对峙隔绝状态。但是，私下的民间贸易一直存在。面对明政府的打压，不少山西边地的军民为了同蒙古进行私市贸易，而选择内外相通，逃到塞外进行贸易。如同阳和军马西川、榆次李孟阳及老营李义等十几个人结成伙，专门到塞外与蒙古人私易马匹。

嘉靖时期，诸多山西汉人群体不断去往蒙古，他们中既有将士官兵、知识分子，也有白莲教徒，但更多的是被掠夺的明朝边地百姓。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是源于明朝政府的日益腐朽，边防的破败不堪。二是明朝繁重的赋役与蒙古相对优越的政策。这种人群的流动客观上促进了边塞地区的发展，增强了蒙汉民间经济的交流、文化的融合。

（作者系山西大同大学云冈学院副教授）



长城地区各民族的发展和融合有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交流和融合的程度、规模在不同的时段内表现出不同的状态，王昭君、三娘子、四公主是长城地带民族融合中的典型代表、民族关系中重要的女性角色。

稽侯珊叩关附汉，王昭君出塞和亲

自汉武帝以来，匈奴屡为汉朝所败，促使呼韩邪不能不考虑归附汉朝中央政权的问题。归附汉朝，在匈奴历史上是一重大转折。

竟宁元年（前33年）春正月，呼韩邪第三次来到长安，汉朝对他优待如前，赐赠较汉宣帝时多一倍。汉廷还根据他自言“愿嫁汉氏以自亲”，将官人王昭君嫁给他为阏氏，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昭君出塞和亲”。

昭君和她的后辈们力促汉匈间和平友好，使得长城内外长期处于和平状态，为汉匈两族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因而，昭君倍受各族人民喜爱。



大同长城与民族融合

刘志尧

大同，与人类社会发展同步，与人类最高理想同名，与社会文明高度同构。大同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交”历史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堪称民族融合之都。

赵长城是沿大同盆地南沿修筑的长城。为何赵肃侯要把赵北长城修筑大同盆地南沿上？因为当时大同盆地被北方民族林胡和娄烦占领着。秦朝，秦始皇派遣蒙恬率30万大军将燕、赵、秦长城修筑连接，大同段秦长城称“紫塞”。汉代，为抵挡北方匈奴，汉廷在赵长城基础上又重新作了加固修缮，称汉长城。北魏时，为防御以柔然为首的草原民族进犯，仍在赵汉长城基础上进

行了重新构筑加固，称“畿上塞固”。明代，为抗拒蒙元复辟，又在前朝修筑长城的基础上大规模修筑了明长城。自此，称大同盆地北沿的长城为大边，或外长城；称南沿的长城为小边，或内长城。

历朝历代沿大同盆地边缘修筑的长城，是一个闭合性的长城，是等于把大同盆地锁了边包围起来的长城。在这个闭合的内长城中，由于受北方草原环境气候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一拨又一拨从河套崛起的草原民族随时会发起南下中原的举动，战争与和平交替出现。但每次战争发生，其进攻势能均会被长城与守卫长城的军事力量所